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 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 都是我的个性、思想 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 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 我知道的虽然很多 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 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 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 早年家里奇穷 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 糊口 四叔做一个佃农 替地主耕种着土地 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 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 祖父病了 家里一文不名 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 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 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 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 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 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 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 边上放一盏油灯 引诱鱼望上跳 等到跳上来 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 风刮的很大 雪花纷纷地飞舞着 父亲如平常一样 照例

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儿，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

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儿，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绔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

赤 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儿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儿。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的拼命跑向目的地去。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里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便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儿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的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

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拥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遽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一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

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

音 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 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 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

康格庄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望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齷齪不堪的房

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 会客、睡觉、厨房、餐室 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 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 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 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 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 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 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 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 常常撒腿就望外跑 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 你才没有跑掉 看看 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 说完了 抬起头来 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 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 没有工夫顾到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 日子久了 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 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 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 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 拿着镰刀 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 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 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 唱着生命的赞美歌 委婉而动听 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 似电流一样 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 我就放大了喉咙 臧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 笑笑说说 跳跳唱唱 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 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 可以用来喂马 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 保定府附近 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 如果不去实际体验 怎么样也是难以想像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 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 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 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 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 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 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 高粱快要成熟 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撇剥 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 撇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 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 谁撇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 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撇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撇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 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 蹲在里头 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 又不能不狠着心 咬着牙 强打精神去撇。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 赤着脚 挽着腿 袒胸裸臂 在里头撇一整天 中间连饭也不吃 因为怕耽搁了时间 叶子都被别人撇完了。出来之后 低头一看 脖子上 胸膛前和两只臂膊 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 不仅饭吃不下去 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 轰轰地作响 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 原野上无草可拔 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 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 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 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 落下很多的干树枝 收集起来 背回家去 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 树叶儿完全脱落 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 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 系上一条长绳 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 随手捋上绳索 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 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 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 这样的鞋子 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 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 有一种缺陷 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 也许小些 也许大些 穿时间久了 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 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下不来 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 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 不好意思上当铺去 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 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 可是快到下旬 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 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 饷一领到手 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 生怕大人算错了账 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 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 每逢赎当 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 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么？”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 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 快走！”

说也奇怪 这种羞怯的心理 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 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 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 不知怎的 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 抬头一望 柜台后头站着的 就是

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苛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

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 维持全家日用必需 已经就捉襟见肘 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 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 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 卧在炕上 像患了霍乱病一样 呻吟呕吐 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 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 哈欠 寒噤 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的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 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 仰卧着也不合适 坐起来也不舒快 左翻右转 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 就横卧在炕上 把腿伸出来 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 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 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 精神也能安定一些 这才勉强合上眼 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 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 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 比看见仇人还气恨 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 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 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 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 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 或特别的祭节 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 戴上大帽子 着上靴子 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 我心里总觉着奇怪 心想这是什么事呢 有时父亲行完了礼 仍不起来 趴在那儿 把头伏在地上 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 声音特别微细 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 弄得我莫名其妙。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 轻轻地走到他背后 侧耳偷听 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 救苦救难 保佑一家平安 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地上嘭嘭嘭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 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 盘起两条腿 像弥勒佛一样 手里拿着一串佛珠 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 他从营中回来 又到炕上打坐 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吓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儿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的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是涨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

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 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 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 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 父亲虽几经筹思 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决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 就觉着如芒在背 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 我从河南回到保定 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 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莹。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吧？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类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九都是褴褛不堪 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 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 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 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 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儿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 其余都是些破旧破坏狼狽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 算做院墙。院墙内外 破乱的瓦器 瘦小的牲畜 是惟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 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 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 穿着臃肿的破棉衣 瑟缩着身肢 慢慢移动着 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 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 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 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 都在反映着人

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搀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也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时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槌，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惟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冶出来。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

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巧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飘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